

海南百年文化背影

韩槐準：古外销瓷研究第一人



一九六二年，韩槐準乘船回国。王凯翻拍

(上接 B10 版)

开海南岛考古之先

韩槐準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陶瓷学、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矿物学、民俗学以及华侨史等多门类、多领域。除了陶瓷学上的成就，韩槐準还是东南亚一位著名的文物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更不容忽视。缘于研究古外销瓷，韩槐準继而涉足考古学领域。通过与研究人类学及史前史的林惠祥教授接触，韩槐準认识了雷公斧、雷公凿等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用具，也经常到佛莱士博物院参观旧石器。

1950 年底，韩槐準回文昌凤鸣村探望母亲，仍念念不忘以前在乡野拾得的雷公凿。抵家不久，他便在以前拾得雷公凿的地方搜寻，结果找到了 10 余件。后来，他又扩大搜索范围，在村子四周被雨水冲刷过的地方搜罗，总共找到了 60 多件雷公凿。随后，韩槐準来到广州，向海南籍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岑家梧谈及此事，并将所拍照片交给他。

后经考古学家研究，这批石器大约有 4000 年左右的历史。由此断定，在史前时代凤鸣村周围十余里，应是古人人类聚居地。海南大学教授唐玲玲说，韩槐準在故乡所搜得的“新石器时代”石器 60 余件，揭开了海南岛考古发现的序幕，第一次为海南黎族历史研究提供了实证性的物件。

1951 年，韩槐準首先在新加坡的《星期六周刊》发表了《在海南搜得的石器》一文，他详细记载了发现古人类石器的地点及方位，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启发了考古学家进一步采集和鉴定，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海南岛史前考古的第一次具有开拓性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

韩槐準发现海南文昌凤鸣村石器之后，随即掀起了一次研究海南石器的热潮。1951 年 9 月，岑家梧来到凤鸣村访问，在韩槐準长女韩爱菊的引导下，又发现了 80 多件石器，此次调查写成了《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文。

1962 年，韩槐準又回到凤鸣村



考古，当时蔡亲雄也加入了外公的搜寻队伍。据他回忆，当时有些墓地里装盛孩童遗骸的瓮已露出地面，外公拍完照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墓地复原，除非瓮已碎裂，才拿走一两块残片作研究，那份对前人的尊重与敬畏让在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唐玲玲这样评价，“凭着韩槐準先生对考古学的功绩，我们可以称他为‘海南文化考古第一人’。”

古稀之年热血报国

在神农药房工作时，韩槐準已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庄园——愚趣园，种植了 400 多株红毛丹。每当自己种植的红毛丹成熟时，韩槐準便邀请朋友们来他的园中品尝，徐悲鸿、郁达夫、许云樵等都成了愚趣园的常客，留下许多故事与佳话。

日军占领新加坡时，韩槐準从神农药房退股，和友人合资创办了华夏化学用品社。苦心经营十几年后，华夏用品社业务蒸蒸日上。正当友人们都为他生活逐渐安定而欣喜时，他却向大家宣布：正计划着回国。他说，希望到国内著名窑地去考察，并到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浏览南洋见不到的古物和古籍，以完成对古外销瓷的研究。

从 1957 年起，韩槐準开始筹备举家回国之事。当时，他将自己苦心搜集的 100 多件文物，陆续寄往北京，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58 年，他将华夏的股份出让，并把两个儿子先送回国内读书。

1962 年初，经著名学者胡愈之力荐，韩槐準收到了故宫博物院正式邀请他回国继续从事陶瓷研究工作的信函。那年春天，韩槐準不顾亲友们的劝阻，忍痛出让了经营了 26 年的愚趣园。3 月 17 日，他带着夫人和幼子崧丰、幼女雅樱，踏上归途。那一年，他已年过七旬。

蔡亲雄说，因担心大量珍贵的瓷器随行太惹眼，回国前外公将珍藏多年的瓷器打包成 11 个木箱，委托同村跑船的兄弟带回国交给郭沫若，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当船只进入海口海关时，海关人员要求开箱检查，跟船的人便照着韩槐準的话说，“钥匙在郭沫若那里，要开箱检查须征得郭沫若同意。”于是，这批文物顺利通关，安全地送到了北京，由郭沫若转交给故宫博物院。

在韩槐準的捐赠品中，有一件景德镇的康熙青龙缠枝花大罐，是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高价从一贩子手中购买的。后来此大罐长期借展于新加坡佛士博物馆，索回时该馆曾出重金意欲收购，并一再加码，但韩槐準并不为之所动，不远万里将大罐送回了祖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说，韩槐準的捐赠品，大大充实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内涵，弥补了我国古陶瓷收藏的空白点，如今成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国后的韩槐準并没有闲下来，继续向学术疆场进军。故宫博物院聘请他为瓷器研究顾问，又经周恩来总理签署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虽然北方凛冽肃杀的气候，让长年生活在热带的老人难以适应，但当时国内学术研究氛围浓厚，让韩槐準倍觉欣慰。此后的 8 年内，韩槐準曾多次到全国各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写成新作《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他也曾数度回海南岛探亲，还在临高发现和考证了宋徽宗的御石碑。在书信中，他快乐地告诉老友许云樵，“我归国后，其身心比在新加坡更为愉快。”

1970 年，韩槐準因患胃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 78 岁。即使在病榻上，韩槐準也不遗余力地回复新加坡友人和后学来信请教的问题，个人不懂的则介绍对方另找他人，或代为询问。

1970 年底，许云樵在《追悼韩槐準先生》一文写道：“南洋有数不清的百万富翁，都是赤手空拳发迹起来的，但从一个略识之无的胶工，一跃而成为博学多闻的考古学家，古往今来，在东南亚千余万华人中，惟韩先生一人而已。”

在海外飘零的四十七载岁月中，故乡凤鸣村始终是韩槐準最割舍不下的情结。如今，韩槐準静静地长眠在他魂牵梦萦的凤鸣村，仰望蓝天，聆听流水，默默地为他传奇的一生划上句号。

韩槐準和家人在愚趣园。 王凯翻拍



“过去人们对中国古外销瓷的研究仅限于明清，韩槐準将这项研究推前至汉唐，而且更加全面系统。”日前，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这样评价。

1934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韩槐準在路边看见一只瓷盘，花了三块钱把它买下。本着好奇心，他追究起瓷盘的来源，于是到各书店及各图书馆去找许多古籍来印证。与古外销瓷结缘后，韩槐準对其的痴迷与执着达到了旁人难以理解的境地。新加坡作家、学者连士升在为韩槐準论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作序中说，“经过长期的努力后，他整天所接触的是陶瓷，他漏夜所研究的是陶瓷，他梦里发出会心的微笑的还是陶瓷。他一面研讨群书，一面搜购宝物，日夜苦思，终于豁然贯通，成为陶瓷专家。”

对陶瓷等文物的搜集，韩槐準也十分舍得投入资金。新加坡淡水河边，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露天旧货市场，韩槐準经常穿着工人服装到那里发掘古董、旧书画、破陶瓷等，收获可谓不小。有时，他会当机立断，以重金买下一件古物。他虽不懂英语，却能讲一口很流利的马来话，因此他能和当地的英国学者交换意见。为了研究需要，他也艰苦地研读英文参考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便请接受过英文教育的朋友帮忙翻译。

由于考查深入，到位，韩槐準推断的一些结论最终得到了今人的认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介绍：韩槐準在南洋地区发现不少属于越窑系统和龙泉窑系统的青瓷，但也发现一些宋元青瓷，根据他的研究，认为应该是华南地区的海南、广东和福建等地区生产的青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评价，“韩槐準先生是一位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专家，特别是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成就卓著。他是我国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

他将中国古外销瓷研究推至汉唐

文\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瓷，这是他从地理、生产技术和适于输出南洋等方面得出的结论；韩槐準的预言和推论在今天得到了验证，譬如他在南洋发现并搜集的“八卦龙凤马罗经字三彩大盘”，已在福建的漳州平和窑等多处窑址发现了。

“古外销瓷研究是近几年才开始逐渐趋热，但几十年前韩槐準就已经开始研究了，可谓超前。”海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何云强认为，韩槐準为我国古外销瓷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韩槐準还通过研究陶瓷来研究中国与南洋的文化史、关系史，这在其《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中国古代之南洋航路》等文章中都有体现。1959 年，韩槐準集 25 年殚精竭虑的研究心血，出版了论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此书对中国古外销瓷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汉唐起溯源，一直追踪到宋、元、明、清代。其独特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曾发现，却又不会流于偏颇，更常于繁征博引，推论考证之中，挟带政情民俗的掌故，处处莫不显扬其平民本色的可爱。

叶文程评价：“韩槐準先生是一位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专家，特别是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成就卓著。他是我国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

周伟民感慨地说：“除了学术研究，韩槐準的自学态度也非常令人钦佩。”韩槐準的自学成功告诉人们，学校并不是求知唯一的地方。除了学校，只要一个人有坚定的意志，不断的努力，他迟早有登堂入室，机杼一家的希望。

(本专题采写得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的支持与协助，特此鸣谢)